

《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25-6260-2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徐莘芳(1930~2011)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267号

责任编辑: 缪 丹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富 强

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

(全二册)

《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插页: 10 印张: 45

字数: 1,000千字 印数: 1-1,500套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260-2 / K · 1511

定价: 198.00元

目 录

始创期的高度：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考古述评	许 宏	1
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美) 罗 泰	13
西汉帝陵的门阙与“门阙制度”	焦南峰	33
关于唐两京城坊建筑的著录问题	荣新江	44
明代卫所城选址与形制的历史考察	李孝聪	59
藤原京、平城京的兴建和古坟的削平——与唐大诏令集对比研究	(日) 菅谷文则	79
辟支塔考稿	杭 侃	89
原始社会聚落内部分化与文明起源	唐晓峰	94
彩陶：庙底沟与半坡文化的渊源	王仁湘	104
试论广富林文化	栾丰实	128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石带功能的探讨	滕铭予	148
“整体保护”理念下的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之关联——大遗址保护规划的 考古工作需求	陈同滨	159
平城地区北魏墓葬研究	李梅田	167
唐代壁画墓与唐代礼制	赵 超	179
试论两汉时期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北传及影响	杨哲峰	195
辽代釉陶的类型与变迁	彭善国	219
试论早期阶段海上贸易的模式——9~10 世纪的文献记载及沉船资料	秦大树	234

关于明代钧州官府窑厂的探讨——兼及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	王光尧	253
元朝刻丝二题	尚 刚	267
明代金银首饰的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	扬之水	284
在韩国发现的明清瓷器的分期与特征	(韩)金英美	301
高僧形像的传播与回流——从“玄奘负笈图”谈起	刘淑芬	333
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罗汉造像的中国化	常 青	360
北朝石窟寺院出现的龙纹类型与其历史意义——云冈、龙门、 响堂山石窟为中心	(韩)李妍恩	385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墙体构造	李志荣	402
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长阿含经》等佛典	李崇峰	419
试论龙门石窟擂鼓台的宝冠-佩饰-降魔印佛像	罗 熠	466
论《史记》“十篇缺”发生时代及其原因	吕世浩	502
汉魏时期的濊人与貊人	王建新	524
王翦南征百越战事钩沉	辛德勇	538
汉代边塞的助吏、省卒、士吏、候长和精兵产地——读《居延新简》札记	邢义田	551
关于敦煌书仪与书状的辨读和再认识	吴丽娱	567
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	朱鸿林	577
名留青石——赵孟頫的碑铭楷书	(美)孙志新	601
西亚、北非和中国的三体文字石刻	刘 雨	617
信古、疑古与释古——《春秋》经、史意义的现代诠释	戴晋新	623
从帝王到孝子——汉唐间图像中舜故事之流变	罗 丰	637
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两代学术领袖的相知与传承	李东华	672
宜兰中药行文化现象初探	宋光宇	694

始创期的高度：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考古述评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中国城市的早期考古研究,更因其处于草创期而影响深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史,还缺乏详尽深入的论述。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先秦城市》)中,笔者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先秦城市研究史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其中的第一期是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前期(1928~1943 年),笔者将其概括为“田野资料的初步积累阶段”。这一阶段的起始以 1928 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为标志,收束则以 1942~1943 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对传说中的周都进行调查为准^[1]。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2](以下简称《学史述论》)是近年这一领域的一篇总结性的论文,作者刘庆柱先生在其中提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可分为始创期(1928~1937 年)、发展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1966 年)与继续发展期(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的分期方案。

我们赞同以“始创期”来命名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包括先秦城市考古和都城考古)研究史。但包括笔者已往论著在内的关于这一阶段城市考古发展历程的研究结论,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1]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2]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考古学集刊》第 16 集,科学出版社,2006 年。

一、关于中国学者城市考古活动的肇始

1. 殷墟真正的城市考古活动发端于 1931 年的第四次发掘

《先秦城市》和《学史述论》，分别把 1928 年中国学者对安阳殷墟的首次发掘作为先秦城市考古和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开端。如《学史述论》认为，“对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而言，真正科学的考古发掘，始于 1928 年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但二者又都注意到了持续 10 年的发掘中田野工作思路与收效的差异。《先秦城市》指出，“1931 年，梁思永先生又参加殷墟发掘，使田野工作的科学水平大为提高。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发掘早期城市遗址”。在此之前，“李济先生在主持工作之初的第二、三次发掘中就开始布置对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学史述论》则指出，“1928 年，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开始的殷墟考古工作，发掘主持者这时还是为了通过田野考古活动，寻找遗址区内遗留的甲骨，并不是将其作为都城遗址考古来进行的”；“1929 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开始把安阳殷墟作为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研究”。

1928~1929 年的三次发掘，一般被学者划分为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甲骨及其埋藏状况而展开的，在指导思想上颇受地质学的影响^[1]。第二、三次发掘虽然在发掘技术上有所改进，但仍局限于小屯一带，在对遗址的成因上仍采用“漂没说”来解释包括夯土在内的各种遗迹现象，没能辨识出夯土建筑基址^[2]。

可以理解的是，并非所有在城市遗址上从事的考古活动，都属城市考古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的界定，应当看其是否主要关注遗迹及其空间关系，也即聚落形态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遗物。即“考古发掘主要是通过城址的遗迹、遗物研究其历史，而不是仅仅为了‘寻宝’”^[3]。或者说，只有遗物或“点”的工作，而无遗迹或“面”的概念，则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墟的前三次

[1]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古代文明》第 4 卷，文物出版社，2005 年。

[2]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 年；张蔚然《殷墟地层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 年。

[3]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考古学集刊》第 16 集，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

发掘,是不能纳入真正的城市考古的范畴的。

1931 年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则被认为开启了殷墟发掘的新阶段,是殷墟发掘史上一次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发掘^[1]。“第四次发掘一开始,我们就在 1929 年测量的遗址上分五个区”,“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发掘者“确信已找到了关键所在,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寻找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2]。“版筑的存在证实后,我们对于商朝建筑的研究,又鼓起新的兴趣来。这是我们发掘殷墟的历史中一个极重要的转点。”^[3]第五次发掘则开始采用第四次发掘前已计划的“整个的翻”(“平翻政策”)的方法。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和记录,前三次发掘提出的洪水“漂没说”被彻底否定。1936 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宫庙区全部采用“平翻法”,以 1 600 平方米为一个工作单位,以 100 平方米为一个小单位^[4],完成了由探沟法到探方法的过渡。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对遗址进行的大面积揭露。

同时,也是自第四次发掘开始,发掘者提出了“要了解小屯,必须兼探四境”^[5]的思想。发掘范围扩展到四盘磨、后岗等地点,后来又扩展到了洹河以北的侯家庄等地。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殷墟发掘者开始有了初级的“聚落考古”意识^[6],是中肯的意见。

2. 1930 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城市考古活动的肇始

追根寻源,殷墟第四次及其后历次发掘在理念和方法上的进步,又得益于 1930~1931 年对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发掘的经验。先后主持 1930 年城子崖发掘和 1931 年殷墟第四次发掘的李济后来回忆道:“(参加第四次发掘的)大多数队员在参加城子崖发掘中都收益很大……城子崖遗址周围有一圈已坍塌的墙,此墙是用夯土建的。仔细审查夯土使人们回忆起前三次在小屯发掘中出现的地层与此惊人地相似;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解释这为洪水沉淀层。”“所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1] 唐际根《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思路与技术得失》,《甲骨学 110 年: 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2]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79 页。

[3]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 年。

[4]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 年。

[5]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 年。

[6] 唐际根《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思路与技术得失》,《甲骨学 110 年: 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为重新解释过去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这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通过对城子崖遗址地面残存的夯土城墙的解剖,辨识出了夯土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遗存,这在中国城市考古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他将遗址分为四个区,共布设了45条探沟,分别在遗址的北、西、南、东四角发掘解剖城墙夯土及相关遗迹。“前次认定遗址四周之城墙为方形,今次乃知其墙之大势乃包围当时人民之住处,故随住址形状而弯曲,以致有数处不甚规则。至于此墙建筑之时代,前次认在灰陶期;今次发掘,于城墙问题更复作特别研究,疑其为黑陶期物。”^[2]“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首次根据地层学原理正确推断遗迹年代的经典之例,体现了当时中国田野考古的最高水平。”^[3]同时,这次发掘也开启了中国考古学者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进行城址考古的先河。

二、中国城市考古的“前史”阶段

陈星灿在论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时曾提出,“要讲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不应忘记在公认的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有一个为时不短的田野调查阶段,其间也包括少数小规模发掘。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前史”^[4]。检视中国城市考古的早期研究历程,我们认为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前史”阶段。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可追溯至20世纪初外国人在边疆各地的工作^[5]。“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以探险、旅行或考古调查等名义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涉及了不少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或古代周边地方政权所在地城址……(这些)活动的主要目

[1]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2] 傅斯年等著《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第10页。

[3]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4] 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的是‘寻宝’,而都城遗址或古代地方政权所在地城址,往往是‘寻宝’者的首选对象。”^[1]这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于这一阶段以外国学者为主的田野考古活动的认识。但详细情况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寻宝”并不能涵盖这些田野考察活动的全部,这些活动中也包含着初起的聚落(城市)考古理念的萌芽。这里,我们试以时间为序简要地罗列一下这些考古或准考古活动。从前文中述及的城市考古的视角出发,我们舍弃了仅在游记类文献中对残存的城市遗迹进行文字描述的考察活动,而对遗迹的实地测绘和精确记录(注重遗迹及其空间关系)为基准来择取这些活动。对某些城市遗址的最早发现、对某些城市地望的最早确认,甚至在某些城市遗址进行过以获取遗物为目的的发掘,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史的意义,但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活动。

1893 年,俄国旅行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考察元上都。在随后出版的日记体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2]中,有对元上都遗址考察的详细记述,对宫城城墙进行了丈量。书中还附有照片。

1898 年,俄国学者德米特里·克莱门斯(又译作 D·A·克列缅茨)被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往吐鲁番进行古代城址的考察。这是西方派往新疆地区的第一支以考古为目的的远征队。“他探索了围绕着吐鲁番的一系列遗址,其中有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雅尔和图,拍摄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建筑物的平面图,抄写了一些碑文和获得了若干手卷以及文物的样品。”^[3]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5 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 A·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先后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遗址,在新疆丹丹乌里克、尼雅、楼兰、米兰等遗址,唐北庭都护府城址、高昌城址,以及内蒙古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等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三次考察活动的成果集中收录于《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4](1907 年出版)、《西域——中亚及中国西部地区探索之详尽报告》(1921 年出版,中文版更名为《西域考古图记》)^[5]和《亚洲腹地——中亚、甘

[1]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考古学集刊》第 16 集,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 页。

[2]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璋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6 页。

[4]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5]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肃及东伊朗探察之详尽报告》(1928年出版,中文版更名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1]这三部大型考古报告和综合性学术专著中。三部书中文版的字数达600余万字,其中对古代城市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收录了大量的珍贵照片以及当时实测的居住遗址、城址、房址、寺院、佛殿、佛塔、烽燧、石窟、古堡、驿站等遗址的平面图、遗址所处微环境的区域平面图和各地区的详细平面图。

孟凡人在评述自1898~1899年到1915年间新疆考古学的肇始阶段时指出:“列强的学者们根据这些劫掠的资料刊布的考古报告、图录和专著,从资料上看,凡其刊布的文物我国现在已绝无仅有;从研究上看,其垄断研究的成果较全面且水平较高(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研究水平)。因此,这些报告和图录就成为我们现在研究新疆汉至唐代考古学的主体基础资料之一,他们论著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则又是新疆汉唐考古学发祥期的奠基之作。这是新疆考古学早期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列强诸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新疆考古探察,不仅拉开了新疆考古学的序幕,而且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开篇之作。但是应该指出,这乃是一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2]这样的评价是合乎实际情况而中肯的。

1906~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实地考察西安秦汉隋唐城址和帝陵,对相关古迹进行了拍摄、绘图并做了详细记载。在此次考察中,足立氏最早使用近代仪器测量古迹的长宽高度、经纬度等,用三角函数等科学方法精确计算,用准确的数据去记录和研究古迹。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尺度里程、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名胜古迹、道观、寺院、古代碑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撰成《长安史迹的研究》一书^[3]。此书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弥足珍贵。侯甬坚在该书新的中译本的作者简介中论道:“可以相信,此书若再版之后,书中所提供的资料、数据、观点和疑问,必将成为日后继续深入研究长安城的有用的线索和依据。”^[4]

1913年,日本学者关野贞、谷井济在对高句丽遗迹所作调查中绘制的吉林集安国内城示意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该城址轮廓的最早的绘图资料^[5]。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国内城北墙、西墙开展工作获取的资料,基本上认证了1913年绘制的国内城示意图中城墙东北角、西南角处的城墙形制及西墙

[1]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孟凡人《新疆考古学百年回顾与展望》,《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 (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の研究》,東京東洋書林,1933年。

[4] (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等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5] (日)关野贞《滿洲輯安縣及び平壤附近に於ける高句麗時代の遺跡》,《考古學雜誌》第5卷3號,聚精堂,1914年。

南门的结构。可知这幅“国内城示意图,在尺寸规格上可能存在误差,但其对城墙轮廓、形制的认定基本可信”^[1]。据记载,民国十年(1921年)曾对国内城实施过大规模修葺^[2],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城的旧貌,因而1913年所绘制的城址示意图,对于该城的复原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2年,黑龙江《宁安县志》成书,书中由吉林陆军将弁学堂毕业的傅明毓绘制的“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图”,是已知最早的利用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该城址的实测图^[3]。

1925年,美国地理学者劳伦斯对元上都进行了调查和实测^[4]。这是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30年代调查发掘前留存于世的最详细、最确切的调查。论文中刊载了有关元上都的平面布局、城门和壕沟的实测图。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原田淑人等发掘辽宁旅顺老铁山麓的牧羊城及其附近古墓^[5]。1931年出版的《牧羊城》报告为八开精装,正文100页,插图45幅,图版63面,英文57页。其中收录了城址实测图、城址附近地形图、城址附近遗迹分布图和发掘沟平剖面实测图。附录中还收录了牧羊城对岸山东福山附近一座城址的资料,报告作者推定为汉代牟平故城。

这些活动尽管往往是以盗掘和劫掠的方式进行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工作也显然失之粗疏和缺乏规范,其历史局限性不言而喻,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知中国城市考古起步阶段的片断和轨迹。

三、关于 1930~1940 年代外国学者的 城市考古活动

陈星灿曾对 1930~1940 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史有过总括性的论述^[6]:“与二十年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页。

[2] (日)池内宏《通沟》(上),日满文化協會,1938年。

[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页。

[4] Impey, Lawrence, “Shangtu: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XV, Oct. 1925, pp. 584-604.

[5] (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牧羊城:南满洲老鐵山麓漢及漢以前遺跡》,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1年。

[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第203—204、264页。

代相比,中国考古学者以及所从事的考古活动已经占据主动地位,五四运动之后的民族觉醒尤其是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之后对文化科学事业的相对重视及对文物考古活动的控制,结束了外国学者在中国的任意考古发掘活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的军队之后,进来了一批批的学术团体。他们的考察团大都以考察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为主”。“1937年的‘七·七’事变则使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中的许多重要的考古活动匆匆停止……与此同时,日本考古学者在其军国主义刺刀之后也在东北、华北甚至华南进行过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内战争爆发,田野考古除了个别的调查之外几乎完全废止。”

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城子崖和殷墟发掘以外的城市考古活动,就基本上是由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从事的。

关于中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学史述论》在列举了高昌古城、唐北庭都护府城址、燕下都、临淄齐故城和滕国故城、西安唐中书省遗址、寿春故城等数项调查发掘活动后,指出“这一时期的古代都城或古代地方政权首府城址的考古工作,大多仅限于考古调查,有的虽然进行了一些考古试掘,但因其面积很小,很难解决城址的布局形制问题,也不可能在都城或城址考古方法上有较大推进”。

关于外国学者这一阶段的城市考古工作,还缺乏学术史层面的系统梳理与分析。这里,我们择要概述外国学者的早期田野报告和今人对其活动的评价,旨在说明这些活动及其成果是否对目前和今后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而中国当代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外国学者的早期田野工作的。

新近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渤海上京城》^[1],不仅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最新的调查发掘成果,同时还在《绪论》一章中较详尽地追溯了该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史,并对已往的田野考古工作加以评述。该节还收录了6张不同时期绘制的上京城遗址平面图,并给出了历次考古发掘位置示意图。这样,最新的工作就与已往工作有机结合,大大提升了报告的学术分量。

在述及“东北沦陷时期”的考古工作时,报告作者指出:“1931年9月,东省特别区(以今哈尔滨市为首府的行政区划)研究会组织综合考察队到渤海上京城进行调

[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8、9页。

查与发掘^[1],标志着上京城的研究进入了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新时期。”“研究会古民族学分队由B·B·包诺索夫领导,地质学博士尹赞勋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古民族学分队在上京城停留了12天,利用探沟法对‘紫禁城’和‘御花园’的主要遗迹进行了发掘,对全城和周边遗迹进行调查,获得了许多文物。同时绘制了‘东京城’遗址的‘紫禁城’(宫城)平面图,记录了宫城的主要建筑及东掖城‘御花园’的部分遗迹。这是目前所见的第二张渤海上京城遗迹图,虽然属于草图性质,但所标注的若干遗迹没能保存到今天,这对于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述及1933~193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上京城遗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报告指出:“这是一次未经我国政府许可的,带有文化掠夺性质的发掘。通过这次工作,大体搞清了宫城内各殿址的布局、规模和形制,对上京城的学术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东亚考古学会’于1939年出版了田野考古专题报告《东京城》^[2]。通过上述调查与发掘,对上京城的格局、形制、建筑特征等有了初步的认识。报告中发表的遗迹、遗物及全城遗迹实测图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中全城遗迹实测图由日本关东军专业测量员绘制,较为精准。”报告还收录了《东京城》报告中刊布的彩色城址全图。

作者最后总结道:“这两次由外国人主持的考古工作,是渤海上京城考古研究的开始。‘东亚考古学会’出版的考古报告在后来的渤海考古研究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俄国学者的首次考古报道虽简略,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冷遇。”这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中国考古学界已拥有了更包容、自信和成熟的心态。

193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调查发掘元上都遗址,并于1941年出版了大型考古报告《上都——蒙古多伦诺尔元代都城址的调查》^[3]。在新近出版的《元上都》一书^[4]中,作者魏坚指出,“元上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原田淑人一行对元上都的调查”。“(他们)对元上都遗址作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和测绘”,“书中较为珍贵的是所附56幅图版、14幅插

[1] 满洲研究所B·B·包诺索夫《“东京城”遗址发掘的初步报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附录四,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の發掘調査》,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9年。

[3] (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上都——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東亞考古學會,1941年。

[4] 魏坚《元上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

图和百余张遗迹和遗物的照片,以及少量的花纹拓片及线图……(一些)碑额照片和拓片,以及宫城南门和诸多石制构件的照片尤为珍贵。现在,许多遗迹和遗物已经不复存在了”。回顾元上都研究史,作者认为“这是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元上都的第一篇田野调查报告”。

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驹井和爱等调查发掘河北邯郸赵王城,1954年出版了田野考古报告《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1]。新近出版的《赵都邯郸城研究》^[2]对此作了述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邯郸城的活动,开始于20世纪中叶,其标志就是1940年日本人对赵王城的勘查发掘。此可视为赵邯郸城考古研究的起步。”“(日本学者)在邯郸的工作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对赵王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与测绘;二是重点对赵王城内的龙台北侧土台(即2号夯土台建筑基址)、赵王城外王郎村北面的梳妆楼和插箭岭两座土台等地点进行了发掘……本次考古发掘的缺点是比较粗糙。”

《赵都邯郸城研究》还介绍了《邯郸》报告所作的综合研究:“该书依据考古发现认为,赵王城即战国赵都邯郸城,汉代赵都邯郸的宫殿北移至今县城的西北地带,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古代邯郸繁荣的中心由南向北转移。另外,还结合齐城(临淄故城)等东周城址的资料,对邯郸城的郭城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推论与后来的考古发现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差距,但其从当时考古发现的证据,首次从考古资料考证认为赵王城是战国赵都邯郸城。该书是邯郸故城考古研究的首批重要成果。”

《邯郸》报告所载“列国都城比较图”,最早见于日本学者关野雄1942年发表的《齐都临淄的调查》一文^[3]。图中用相同的比例尺汇集了易县燕下都、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滕州滕国故城、薛国故城和赵王城的平面图。这些都城遗址除了燕下都系中国学者马衡率队调查发掘^[4],其余城址的材料均为日本学者踏查所得^[5]。尽管这些材料由于历史的局限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比较研究也

[1] (日)驹井和爱、关野雄《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の发掘》,东京:东亚考古学会,1954年。

[2] 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3] (日)关野雄《齐都临淄の调查》,《考古学杂志》第32卷,第11号,第577页,1942年。

[4] 傅振伦《燕下都发掘报告》,《国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2年。日本学者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参加了此次考古活动。

[5] (日)关野雄《齐都临淄の调查》,《考古学杂志》第32卷,第4、6、11号,1942年;(日)关野雄《滕城と薛城の遺跡について》,《考古学杂志》第33卷,第6号,1943年;(日)驹井和爱《曲阜鲁城の遺跡》,《考古学研究》第二册,1951年。

仅限于较浅的层面,但就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探索而言,在田野资料仅处于初步积累阶段的当时,已有了整合比较、寻找城市发展的时代规律的研究视野,是难能可贵的。

在列举了日本学者一系列的都城考古活动后,《学史述论》指出“上述 20 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古代都城考古发掘,具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为了‘寻宝’,他们违背国际通用的考古发掘方法,造成了对遗址的破坏、学术研究的混乱”。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此展开论述。

《学史述论》把都城考古始创期的下限定在殷墟发掘中断的 1937 年,显然没有把上述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城市考古活动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同意中国考古学应理解为中国区域内的考古学而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考古学的话,我们也就应当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始创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徐莘芳在 50 年代总括中国考古学史时,曾论及“(抗日战争前后,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城址的调查是较重要的,如临淄、曲阜、邯郸、滕城、薛城、北魏平城、辽金的北京城、元上都、祖州城等都做过调查和发掘……目前日本人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仍具有一些水平”。“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一部中国近代文物被掠夺的历史。其间,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作的考古工作,也是较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进行必要的整理和研究。”^[1]现在看来,仍是极精到的评价。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2],其中《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 年)》也收录了中国考古学草创期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先秦城市》把先秦城市研究史第一期的下限定在 1943 年(是年,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分别结束了对传说中周都的调查和对曲阜鲁城的调查发掘^[3]),并对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做了简评:“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揭开了科学意义上的先秦城市研究的序幕,不仅为日后的深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之功,奠定了考古学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如果我们认可“要评价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必须将政治与学术分开”^[4]的观

[1] 徐莘芳《考古学简史》,收入《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60、161、164 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3]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1949 年;(日)驹井和爱《曲阜鲁城の遺跡》,《考古学研究》第二册,1951 年。

[4]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 年,第 50 页。

点,由这篇小文所做的简要述评,可以认为上述对中国学者城市考古早期研究的评价,也是适合于所有始创期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活动的。

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而同名学位论文,则是在徐苹芳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该书定稿至今已逾十年,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发现与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检视包括自己在内的城市考古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论,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应当是有益于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小文本为恭贺恩师 80 寿诞而作,不意竟成纪念,怅然之情,难以释怀,仅以此聊表寸草报晖之心。